

“犹太性”与“美国化”之间的张力

——二战前后美国犹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演变

姜胤安*

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美国左翼知识分子中包含了许多信仰共产主义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们的影响以及规模在 30 年代到达高点。他们参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因之一在于融入美国的过程中面临了“犹太性”与“美国化”之间非此即彼的巨大张力。然而二战期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不仅造成许多知识分子动摇了其亲苏亲共的立场,同时也增强了原本正在消退的“犹太性”。随着战后原本紧张的“犹太性”与“美国化”之间张力的消退,加之冷战自由主义成为了可以兼容“犹太性”与“美国化”的新立场,从而造成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犹太知识分子中的式微。

在战后美国知识界,犹太知识分子中许多最著名的旗帜人物一直都被视作反苏反共的先锋代表,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七八十年代的诺曼·波多雷茨(Norman Podhoretz)直至今日《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主编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都是如此。事实上,反苏反共这一立场并非就是美国犹太知识分子一直以来的传统,恰恰相反,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中有许多都曾经参与了左翼激进政治,出现了一批影响很大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美国知识界中,共产主义影响巨大,最有“话语权势”,几乎所有左翼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与共产主义或者美国共产党有所联系。戴安娜·特里林日后回忆当时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Fellow Traveler)对美国知识界的影响还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 姜胤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



受到影响的是整个文化、整个知识界。”^①

然而在二战之后,共产主义在犹太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却发生了衰落,其中许多代表人物甚至逐渐转向反苏反共的冷战自由派立场。对于这一过程,尽管并没有成为国外学界的热点,但在其他领域,比如文学激进主义的研究^②、冷战政治学的研究^③中都有所涉及,还有知识分子史学者以其中个别群体和知识分子圈子为研究对象,将个别代表性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一过程中的转变视作其自身“犹太性”的“回归”^④。而笔者则以“犹太性”与“美国化”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为线索,尝试以知识分子融合的视角来理解为何在战前战后会发生这些变化。

一、战前犹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繁荣

英语中“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具有两个起源:其一源自法语 Intellectuel,伴随着法国著名的德雷福斯运动而产生,并在 20 世纪逐渐发展壮大,其主要人物包括左拉(Émile Zola)、萨特(Jean-Paul Sartre)、阿隆(Raymond Aron)等人^⑤;其二则是源自 19 世纪一群致力于将西欧哲学引介到沙俄的东欧知识分子,即 Intelligentsia。对于美国“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而言,两者之中后者的影响更大。随着俄国在 19 世纪的改革失败以及沙俄政府的大规模排犹,大

① Joseph Dorman, *Arguing the World: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Their Own Word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 58.

② 较为著名的有 James Gilbert, *Writers and Partisans: A History of Literary Radicalism in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③ 在 Murray Friedman 的 *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 Jewish Intellectuals and the Shaping of Public Poli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一书的前部有较为翔实且卓有论断的论述,尽管这一部分并非弗里曼研究的中心点,而且许多学者对他的观点也不赞同,福山就认为总体而言弗里曼存在相当的偏见,详见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④ 这一视角最为著名的就是 Alexander Bloom, *Prodigal Sons: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书名中的“浪子回头”(Prodigal Son)一语出自《圣经》“浪子回头”(The Prodigal Son)这一典故。布鲁姆用“浪子回头”来比喻“纽约知识分子”从早年“逃离”犹太到晚年“回归”犹太的这一转变。然而布鲁姆的研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纽约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并非完全是犹太知识分子群体,一方面这一群体中自始至终都有非犹太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其中的犹太知识分子参与犹太问题的探讨与研究更多的是以个人身份,而作为一个整体,这一群体并没有将犹太问题作为整个群体的关注中心,其成员科恩(Elliot Cohen)也认为作为纽约知识分子最中心的杂志《党人评论》从未想成为一个犹太杂志。因此尽管“纽约知识分子”中包含了大量犹太知识分子群体的核心人物,但仍然不能将这一群体等同于或者视作犹太知识分子的主要组成。

⑤ 有关法国知识分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可参见吕一民、朱晓罕《良知与担当》,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量东欧犹太知识分子^①在 19 世纪后期远渡重洋逃难到美国,这些知识分子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犹太人原有的文化,他们带领这些新的犹太移民在逐步融入美国的过程中,与美国本土传统知识分子一同组成了一个新的包含大量犹太人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在 20 世纪初逐渐发展壮大,其左翼主要派别包括:

其一是较为温和的“进步派”(Progressives),主要受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的影响,至 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其主要代表人物为杜威(John Dewey)等人。他们更加致力于改善劳动环境、提高劳动报酬等社会进步改革,在思想脉络上受传统自由主义影响较大,倾向于改革而并非革命。

其二则是较为激进的“共产派”(Communists),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1917 年的俄国革命则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群体的壮大。美国共产党在此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仅组织创办了一系列文宣刊物,例如《青年工人》(*Young Worker*)、《新群众》(*New Mass*)等,而且围绕这些刊物组织了不同的知识分子小团体。而“共产派”这一派别还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讲,“共产派”主要指在美国共产党旗下或周围的支持苏联、亲近美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常用大写 C 的 Communist 来指称,由于其基本与苏联官方保持一致,因此也有学者使用“斯大林派”(Stalinist)这一名称;而广义上的“共产派”则包括所有自认为归属于共产主义旗下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被称作“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主要有与“斯大林派”为敌的托派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很大的左翼社会主义知识分子^②,其中前者的犹太代表主要包括阿尔伯特·威斯博(Albert Weisbord)、费力克斯·莫罗(Felix Morrow)、阿尔伯特·古德曼(Albert Goldman)等人,他们的主要阵地是托派官方报《战士》(*The Militant*);而后的犹太代表则有古斯·泰勒(Gus Tyler),他最早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与托派关联密切。^③

① 即 Intelligentsia。

② 对于“communist”一词的大小写含义的区别,美国知识分子中的泰斗拉夫(Philip Rahv)曾经在 1967 年作过详述,详见 Alan Wald,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Anti-Stalinist Left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80s*, Chapel Hill/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7, p. xv. 事实上,对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communist intellectual)一词的使用同样存在这种歧义,许多学者仅使用狭义含义,特指与美国共产党有关的知识分子或者是美国共产党同路人(fellow traveler)而不包括与美国共产党或苏联无关或相敌对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而笔者则赞同拉夫的观点,认为这部分知识分子应当用大写 Communist intellectual 来指代,而小写 communist intellectual 则完全依靠思想意识形态划分,即知识分子中所有在意识形态上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共产主义者。

③ 除了这两派之外,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等同属左翼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当时影响也很大,但在知识分子层面上却不如上述两派那样特征鲜明,泾渭分明,许多地方与两者都有交集,且与本文关联不大,因此笔者在此不再详述。



尽管对于普通犹太民众而言,他们不仅认同进步派的理念,而且还积极参与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但是对于犹太知识分子而言,相比于温和的进步派,主张激进革命的共产派显得更有吸引力,尤其是在 30 年代的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中,包含了许多犹太青年知识分子。一些著名的犹太报纸杂志的立场都受到了影响,最为著名的当属受到传统犹太社团资助的《烛台》(*Menorah Journal*),在 30 年代初期开始逐步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有着相当广泛的作者群体;而当时美国共产党所创立的意第绪语^①报纸《弗莱海特报》(*Morgen Freiheit*)旗帜鲜明地表明共产主义的立场,在犹太知识分子中很有市场。参与其中的包括一批信仰共产主义或者同情共产主义的文人,主要有小说家埃德温·西弗(Edwin Seaver)、以赛多·施耐德(Isidor Schneider)、斯坦利·博恩肖(Stanley Burnshaw)、批评家路易斯·洛佐维克(Louis Lozowick)以及创作较少但是长期担任《烛台》编委的艾略特·科恩(Eliot Cohen)等人。^②而在读者层面,还有大量青年犹太知识分子追随这些报刊,不仅研读学习,而且积极投稿。此外,犹太知识分子中还有许多直接加入美国共产党或者其外围知识分子组织,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 of CPUSA)下属中设立了犹太部(Jewish Bureau),在犹太部所属知识分子的努力下于 1929 年建立了一个犹太知识分子组织“无产者之笔”(The Proletpen),其参与人数从 54 人逐渐在 30 年代中期增加到了 80 人,其中包括了几乎当时全部共产派犹太知识分子中的头面人士,“无产者之笔”还建立了自己的刊物——《信号》(*Der Signal*),^③与美国共产党直属的《新群众》都在犹太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此外,随着共产主义理念在犹太知识分子中影响的扩大,共产派知识分子参与建立了教授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校”(Communist School),马尔默(Kalmen Marmor)以及明德尔(Jacob Mindel)担任了最初的校长。^④由此在 20 世纪 30 年代,犹太知识分子中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规模以及影响都出现了高峰。尽管在这一时期他们在美国知识界的影响并不突出,总体上仍未能进入美国知识界的中心,但仍然值得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与普通美国人或者其他族裔的美国

① 意第绪语是东欧地区犹太人所使用的语言,属于日耳曼语的一支,最早源自 9 世纪,在美国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

② Alan Wald,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Anti-Stalinist Left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80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7, p. 46.

③ Bat-Ami Zucker, “Jewish Communists and Jewish Culture in the 1930s,” *Modern Judaism*, Vol. 14, No. 2, May, 1994, p. 178.

④ Bat-Ami Zucker, “Jewish Communists and Jewish Culture in the 1930s,” *Modern Judaism*, Vol. 14, No. 2, May, 1994, p. 17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人相比,当时的犹太知识分子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比例明显要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犹太”与“共产主义”两者之间看上去自相矛盾——犹太民族传承千年的强大的民族性与共产主义所主张的超越民族性之间可是存在冲突的。

从思想脉络而言,这些犹太知识分子参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因在于,相比较于普通美国知识分子,犹太知识分子缺乏对美国政治及其理念的积淀与熏陶,因而他们更容易倾向于“重建”美国而不是“修复”美国。进步派所发源的进步主义运动思想的源流是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其实质是在对美国资本主义政治认可的前提下进行各项现代化改革,尽管普通美国犹太人对于进步主义的主张积极支持,并且某种程度上 20 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中犹太人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但这种支持与参与更多的是出于现实考量,而非思想传承;对于犹太知识分子而言,缺乏思想传承的结果之一就是同样缺乏对于美国资本主义政治的认可,因而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本质缺陷这一论点也就更为接受,而“大萧条”带来的一切对他们而言都毫无疑问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这也是为什么在二三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会有如此广泛的犹太人参与其中。

然而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大量犹太知识分子在“同化”入美国的过程之中感受到了自身“犹太性”与“美国化”两者之间近乎于非此即彼的强大张力,在张力的冲突之中才选择了共产主义。

在经济、社会层面,普通犹太人的“美国化”进程基本上是很顺利的,大部分犹太人迅速“融化”进了“民族大熔炉”里^①,但是知识分子的“美国化”与普通民众的美国化存在不同,知识分子的“美国化”不仅要求知识分子进入知识界的中心地带,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也要融入美国传统。然而首先,“犹太性”在 30 年代逐步成为了犹太知识分子融入美国知识界的阻碍,无论是犹太文学,还是犹太文化或者犹太宗教,在那个时代都远远不是知识界关心的热点问题,犹太知识分子对于犹太文化的思考不仅丝毫无助于他们加入美国知识界的主流,而且出于西方社会传承千年的犹太偏见,这只能进一步造成犹太知识分子与美国知识界主流的疏远。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是最早在美国文学上卓有建树的犹太人之一,其本科和硕士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然而他却在 1936 年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导师的聘任中落选,他所在部门的负责人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原因之一就是他是犹太人。即便是在他有关英国文学家马修·阿诺德的研究名著发表之后,也还是在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个人关照下,他才成为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

① 邱文平:《同化的悖论:“熔炉”犹太人和美国精神的互动》,《史林》2011 年第 1 期。



历史上第一个能担任副教授的犹太人。^① 而“犹太性”对于知识分子融入美国化的另一个巨大阻碍在于语言文学,当时美国犹太人主要使用意第绪语,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写作,意第绪语都被视作“犹太性”的代表之一,但是意第绪语一方面与当时的美国文学关联甚小,越是关注意第绪语文学就越在犹太知识分子与“美国化”之间造成隔阂;另一方面,意第绪语在日常的广泛使用也限制了英语的使用,并造成了犹太人在意第绪语世界与英语世界之间的撕裂,这种撕裂的创伤使得许多犹太知识分子在晚年还记忆犹新。日后作为意第绪文学大师的欧文·豪(Irving Howe)在上幼儿园的第一天就因为自己使用意第绪语词汇而遭到同伴嘲笑,文化冲突的创伤使得豪当即决定再也不跟父母用意第绪语对话。^② 犹太文人卡汉(Abraham Cahan)曾经收到一封犹太青年时期的来信,信中称他的父亲在公开场合说意第绪语令他感到尴尬。^③ 这种尴尬的根源不在于语言,而在于语言背后“犹太性”与“美国化”之间的张力。

而另一个方面,知识分子的“美国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损伤“犹太性”。一方面,“美国化”所要求的一系列思想、价值观的转变对犹太宗教而言是颠覆性的。“美国化”尽管被视作宗教自由、政教分离的代表,但是其精神最初来自清教徒,而在宗教传统上,美国也毫无疑问是基督教国家。不仅如此,“美国化”还表现出明显的世俗化特征,这些都冲击着原本信仰犹太教的犹太知识分子逐步动摇宗教信仰。青年时期的贝尔(Daniel Bell)就曾经向拉比倾诉过自己宗教信仰的动摇,但是拉比的回复不仅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而且还带有一丝嘲讽,反而更加坚定了贝尔不信教的决心。^④ 类似的情况不仅出现在贝尔身上,这也是当时许多犹太知识分子在面临犹太教问题时的写照,“美国化”的世俗性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犹太性”的宗教性。

而更重要的是,“美国化”对于“犹太性”的损伤还在于影响了犹太知识分子的犹太归属感,并因此造成了犹太知识分子普遍的在身份方面的自我认知焦虑乃至自卑。在“美国化”与“犹太性”两者之间,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存在一个身份的认知问题,“美国化”意味着以“美国作家”或者“美国人”的身份加入知识界

① Diana Trilling, *Lionel Trilling: A Jew at Columbia*, *Commentary*, Mar., 1979, p. 44. 转引自 Alexander Bloom: *Prodigal Sons: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3.

② Alexander Bloom, *Prodigal Sons: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0.

③ 李爱慧:《论早期东欧移民在美国的文化适应》,《世界民族》2007年第1期。

④ Alexander Bloom: *Prodigal Sons: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48.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之中,这就必然模糊犹太知识分子的犹太属性,而“犹太性”的模糊尽管看似在同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但仍然带来了强烈的焦虑感。这一点在 30 年代以前的犹太文学中有非常明显的表现。卡汉的名著《戴维·莱文斯基的发迹》(*The Rise of David Levinsky*)就体现了犹太人“为美国文化所同化过程中的犹太人身份认同问题”。而 20 年代赫克特的《一个坠入爱河的犹太人》(*A Jew in Love*)中的主人公不仅想要逃避犹太,而且为自己的“犹太性”而羞愧。^① 尽管作者本人并不一定赞同作品中人物对待“犹太性”的观点,但是其中却反映出在当时的犹太知识分子中,“美国化”带来的犹太身份认同焦虑在知识分子中是较为广泛的。

这些“犹太性”与“美国化”之间的张力都使得无论是接受“美国化”还是重返“犹太性”都困难重重,犹太知识分子似乎处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既然两者的兼容十分困难,因此部分犹太知识分子开始转而摒弃两者,转而寻找一个新立场,这个立场憧憬一个没有民族歧视、融合民族差异的世界,与美国犹太人广受影响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②理念暗暗相合。这一理念不仅仅是像许多学者研究过的那样源自犹太移民的来源——东欧犹太人,而且这一理念也是犹太知识分子在自身“犹太性”与“美国化”巨大张力之间的必然出路。这一理念驱使矛盾和冲突中的犹太知识分子试图既放弃对已经无法找回的犹太民族传统的坚持,同时又放弃融入美国文化的尝试,转而寻求一种全新的、能够包容各个不同种族的新文化,而共产主义则恰好满足这些犹太知识分子的需求。

首先,共产主义主张平等、大同的政治理念以及没有民族歧视、超越民族性的民族观念表现出十分强大的“国际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际主义”。在共产主义理念中,知识分子所要为之奋斗的并非民族立场,因而无论是“犹太”还是“美国”,都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过程而非目的,模糊乃至放弃“犹太性”或者“美国化”在共产主义理念中都不仅不是尴尬或者罪责,反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犹太知识分子组织“无产者之笔”就宣称:“我们用武器……向民族主义(特别是犹太民族主义)宣战……我们追求国际主义,追求苏维埃,追求苏联。”^③

其次,在共产主义理念下,阶级性取代了民族性,犹太知识分子不需要在“犹太性”与“美国化”两者之间做选择,此前犹太知识分子身份认知的焦虑不再存在,因为共产主义理念为其找到了替代,那就是知识分子的阶级性。知识分子的阶级性取代并超越了原本让知识分子焦虑的民族性,让这些犹太知识分子有了

① 朱娟辉:《由小说关照 20 世纪美国犹太文学发展历程》,《湖南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 期。

② 也有称之为 Universalism。

③ Bat-Ami Zucker, “Jewish Communists and Jewish Culture in the 1930s,” *Modern Judaism*, Vol. 14, No. 2, May, 1994, p. 179.



新的身份认同,在共同的阶级性认同下,大量犹太知识分子以无产阶级文学为己任,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和拉夫(Philip Rahv)当时就强调文学必须与其所表现的革命阶级紧密联系,不然将必然失去根基,失去对文学的信心。^① 西弗等人也将精力投入了“无产阶级小说”(Proletarian Novel)的探讨之中^②,乃至30年代犹太文学的主题可以说就是无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不仅是犹太知识分子的凝聚力所在,而且从阶级立场上也更为符合从劳工到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特别是东欧犹太后裔的阶级状况,东欧犹太后裔在1924年时已经达到240万人,但大多生活在东部大城市,为血汗工厂卖命。^③ 而犹太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无法完全依靠写作生存,犹太人普遍的社会底层的状况不仅是他们亲眼所见,也是他们亲身经历的,这些都间接增强了无产阶级的身份认同。

其三,在共产主义之中,“美国化”也不再是犹太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苏联替代美国成为了许多犹太知识分子憧憬的榜样,甚至于许多犹太知识分子自认的任务之一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美国。他们中有许多还参加了美国共产党或者是美国共产党所组织、掌控的外围组织,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约翰·里德俱乐部”(John Reed Club)。该组织称得上是美国共产党旗下的青年知识分子“孵化器”,美国共产党借此来招募有志于共产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而在参与其中的犹太知识分子的笔下,类似于“参与到与帝国主义战争、纳粹、民族与种族压迫等等的斗争中去,并且致力于废除一切滋生邪恶土壤的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世界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苏联的成功都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生活以及艺术”等辞句都大量出现,甚至还曾经公开宣布要“保卫苏联”,^④这正是因为在这些犹太知识分子看来,苏联以及美国共产党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成就,也正是他们所追求的,能够弥平“犹太性”与“美国化”张力的“国际主义”的典范世界。而通过对苏联的憧憬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在知识分子的参与下,在美国也同样可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由于共产主义理念提供了一个能够解决“犹太性”与“美国化”之间张力的立场,因而吸引了许多犹太知识分子投身于这股共产主义的“热潮”也就是自然而然了。

① Wallace Phelps, Philip Rahv,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Partisan Review*, Vol. 1, No. 3, 1934, p. 3.

② Edwin Seaver, “What Is A Proletarian Novel,” *Partisan Review*, Vol. 2, No. 7, 1935, pp. 5-7.

③ 邓蜀生:《美国犹太人同化进程初探》,《世界历史》1989年第2期。

④ *Editorial Statement*, *Partisan Review*, Vol. 1, No. 1, 1934, p. 3.

二、二战与犹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

犹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还是呈现蒸蒸日上的态势,然而在 40 年代到来之前,其中许多人就已经出现了思想“骚动”,而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他们对于犹太文化的关注以及其自身的“犹太意识”出现了逐步增强的趋势。

与原本高调宣扬阶级斗争以及超越民族的国际主义不同的是,苏联在战前几年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同时其领导的共产国际也开始出现政策转向,共产国际出台了试图争取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当局支持的“人民阵线”(People Front)政策^①,其后甚至出现与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和谐相处的示好行为,尽管现在我们认为苏联的这一政策转向是出于自身反对纳粹的需要,但是在共产派犹太知识分子看来,这更像是由阶级立场向民族主义立场“叛变”。而我们知道,民族主义可是许多追求“世界主义”的犹太共产派知识分子们所竭力扬弃的,他们之所以憧憬苏联,正是因为苏联并不存在那困扰他们许久的“犹太性”与“美国化”之间的张力问题。因此“人民阵线”让许多原本属于犹太共产派的知识分子感到失望,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就批评其绝不是苏联当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统一战线”,而是“在保守势力的联合面前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原则”^②。而 1939 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则被看作这一转向以及苏联民族主义的顶峰,欧文·豪(Irving Howe)就将他得知纳粹和苏联媾和的日子称作他人生中“最糟糕的日子”^③,因为苏德和约的本质被原本憧憬苏联的犹太知识分子视作出于民族利益而放弃了阶级利益,更何况对方是曾经被苏联以及共产主义视作死敌的纳粹,因而也就动摇了原本对苏联憧憬的立场。

由此,一部分原先属于美国共产党组织的知识分子斩断了与美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其中许多转而与同属共产主义阵营的托洛茨基越走越近,从而间接壮大了托派知识分子的阵容,他们在知识分子政治光谱上属于反斯大林派。而另

① “人民阵线”是共产国际在 1935 年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一项新政策,决定在资本主义国家扩大阶级联合,改变原先只联合各国工人阶级的政策,转而试图团结包括之前曾经严厉抨击过的社会民主党在内的诸多左翼或者中左阶层。共产国际所推行的这一“人民阵线”政策的实质是通过扩大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跨阶级的统一战线,以此来换取资本主义国家不同阶级对反法西斯运动的支持,并以此减轻之前苏联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所承受的压力。

② Sidney Hook, “The Anatomy of the Popular Front,” *Partisan Review*, Vol. 6, No. 3, 1939, p. 40.

③ Joseph Dorman, *Arguing the World: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Their Own Word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 79.



外一部分则选择“留守”美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政治光谱上属于斯大林派。其中前者主要聚集在《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周围,许多都归属于日后一个被称为“纽约知识分子”(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的知识分子群体,尽管人数较少但是在共产派中影响却很大。而后者仍然聚集在美国共产党及其犹太部旗下,仍然代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正统”。而即使这些“正统”知识分子也在战前几年出现了一个转变,那就是对于犹太问题的关注及其“犹太性”意识与日俱增。

之前很长时间里,犹太文化特别是意第绪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是“推动工人阶级斗争的工具”^①,纳迪尔(M. Nadir)总结犹太共产主义者的立场就是:“反对犹太文化(Jewish Culture)或者文化的犹太化(Judaizing the culture),支持的是意第绪语书写文化(Culture in Yiddish).”^②而随着纳粹德国的日渐强大以及人民阵线政策的出台,从美国共产党犹太部领导到一般知识分子都开始重视犹太以及犹太文化。1938年12月,犹太部组织的“犹太共产党人全国大会”(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Jewish Communists)正式承认犹太文化的重要地位。而犹太部的书记约瑟夫·苏尔坦(Joseph Sultan)也为过去没能够重视犹太文化而感到后悔。^③

如果说犹太部领导下的这种对犹太文化的重新重视对于犹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犹太性”意识的重新觉醒的影响还不够普遍的话,那二战的爆发则是彻底激发了几乎所有犹太知识分子的犹太意识,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犹太与美国两者站在了同一条战壕中。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已经在欧洲正式爆发,但是直到1941年底以前,美国仍然保持中立的立场,但是美国知识界对于美国是否应当介入以及如何介入早已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对于犹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而言,在是否介入战争的看法上较为一致,大部分都支持参与抗击纳粹,不过在对战争性质的理解上却存在两种看法,其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是一场由资本主义的衰落与危机引发的“帝国主义战争”。犹太知识分子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以及克莱蒙·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就秉持这一立场,两人在1941年德国向苏联宣战后发表了一篇题为《有关战争的十项建

① Bat-Ami Zucker, “Jewish Communists and Jewish Culture in the 1930s,” *Modern Judaism*, Vol. 14, No. 2, May, 1994, p. 181.

② Bat-Ami Zucker, “Jewish Communists and Jewish Culture in the 1930s,” *Modern Judaism*, Vol. 14, No. 2, May, 1994, p. 177.

③ Bat-Ami Zucker, “Jewish Communists and Jewish Culture in the 1930s,” *Modern Judaism*, Vol. 14, No. 2, May, 1994, p. 181.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议》一文,两人坚决否认美国介入战争的正义性,只不过纳粹比美国的民主资本主义更加邪恶而已,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在此只不过是更不坏的选择罢了,而在纳粹被击败之后,知识分子仍然应当坚持批判美国资本主义以及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这一传统方向。^① 这一立场从理论上来说正是大多数犹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 30 年代乃至之前的普遍观点,同时也符合苏联以及美共在 1935 年人民阵线政策出台前的官方态度,然而此时却已然没有多少追随者。很快菲利普·拉夫作为另一种看法的代表针锋相对地撰写了《十项建议与八个错误》,认为此时麦克唐纳等人还在坚持共产主义革命简直就是空想,唯一能够击败纳粹的就是资本主义民主的美国,因此应当摒弃前嫌,支持即将参战的美国政府。^② 拉夫的观点在犹太知识分子中毫无疑问产生了更大的影响,麦克唐纳等人因此在广受犹太知识分子欢迎的《党人评论》的编委中失势,转而独自创办了一个新的杂志《政治》(*Politics*)。事实上,无论是麦克唐纳所代表的观点,还是拉夫所代表的观点,都与其犹太身份有关,这两方面支持美国参战的极为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反对迫害犹太人的纳粹,只不过与麦克唐纳仍然“抗拒”美国不同的是,拉夫代表了更多更加“亲近”美国的知识分子的立场。

三、战后张力的弥合与新型美国犹太知识分子的形成

二战后期至冷战期间,美国犹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相比战前已然大大衰落。一方面,许多曾经的而且是十分著名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转入了反苏反共的阵营。比如胡克,他曾经在 20 年代公开以“为何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为题目与自己的老师杜威进行辩论,并由此长期被视作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然而战后他却变身为了反苏反共最积极的犹太知识分子之一。他在二战期间组织建立的反苏知识分子组织“文化自由委员会”(Committee for Cultural Freedom)不仅明确强调“不持特定的社会哲学”(No particular social philosophy)^③,而且还邀请了“进步派”的代表杜威来担任主席。这一组织在战后进一步成为了美苏冷战中西方阵营的旗手之一,其中许多成员甚至接受了中央情报局的资助,建立了包括克里斯托的《邂逅》(*Encounter*)在内的一些杂志参与美苏意识形态

① 两人将继续坚持孤立主义的观点称为“乡鄙之言”(Provincial Inanity),参见 Clement Greenberg, Dwight MacDonald, "Ten Propositions on the War," *Partisan Review*, Vol. 8, No. 4, 1941, p. 271.

② James Gilbert, *Writers and Partisans: A History of Literary Radicalism in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46.

③ Terry Cooney, *The Rise of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Partisan Review and Its Circle*,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6, p. 143.



的战争。^① 而曾经坚决批判资本主义并推动美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麦克唐纳也在建立《政治》杂志 5 年之后舍弃了这一立场,转而对苏联以及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1957 年,他推出了文集《革命者回忆》,在回忆中他称自己已经从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转变到了美国立场。^② 而另一个方面,战后新生代犹太知识分子中不仅左翼激进共产主义者十分稀有,而且反苏反共成为了大部分新生代犹太知识分子的政治共识,就连其中的左翼分子,始终坚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欧文·豪也不例外。贝尔甚至称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 50 年代已然成为了“历史档案中的一个记号”而已。^③ 而更明显的衰落信号,则表现在犹太知识分子所参与的报纸杂志中,一方面像《弗莱海特》报等“正统”共产主义报纸杂志的影响力以及追随的群体都不如往昔;另一方面,曾经坚持共产主义立场或者同情共产主义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很深的杂志,像《党人评论》等也都转变了阵营,1945 年由“美国犹太人大会”组建的期刊《评论》(Commentary)逐渐成为犹太知识分子最主流的杂志,而犹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则基本无法参与其中。这一切都表明,到了冷战时期,犹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美国的地位大不如前了。

笔者认为,共产主义在犹太知识分子中“衰落”的原因之一正在于原本剑拔弩张的“犹太性”与“美国化”之间逐渐发生了由彼此对立到相互统一的转变,冷战自由主义的出现代替了共产主义理念,成为了可以弥合“犹太性”与“美国化”之间张力的新立场。

从思想上而言,战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为“犹太性”与“美国化”张力的弥合提供了共同的思想基础。战后美国知识界对二战这一灾难的根源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中冷战自由主义者将其视作“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恶果,而“极权主义”问题也是冷战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直以来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在这一讨论中,犹太知识分子不仅参与其中,而且在犹太知识分子的研究下,“极权主义”的起源之一正是西方自古以来的排犹或者说是犹太歧视。阿伦特(Hannah Arendt)作为其中的代表发表了《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书,其中不仅探讨了“极权主义”的犹太迫害问题,而且将苏联与纳

① 有关于中情局资助知识分子的问题,详见[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 年版,以及梯姆:《CIA 渗透国际文化的一段历史》,《读书》1990 年第 9 期。

② Dwight MacDonald, “Introduction,” *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7.

③ Daniel Bell, *Marxian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193. 转引自 Michael Kazin, “The Agony and Romance of the American Lef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0, No. 5 (Dec., 1995), p. 1488.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粹在“极权主义”问题上画了等号。^① 在犹太学者的研究之下,“极权主义”不仅仅对犹太民族造成了灾难,而且也塑造了纳粹德国这样一个怪物,而更为“可怕”的是,苏联在这些犹太知识分子的研究之下即将成为另一个纳粹。因此在反对“极权主义”这一问题上,犹太知识分子与冷战自由主义站在了同一立场上,对“极权主义”的反对不仅是对反犹主义的反击,同时也是对纳粹与苏联的反击。

而战后美国知识界中,“犹太性”也不再是阻碍犹太知识分子进入知识界中心这一知识分子“美国化”的关键一步的阻碍,相反,通过犹太知识分子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大量犹太知识分子借此进入了美国知识界的中心舞台。而二战后另一个被全世界关注的问题就是二战期间纳粹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在二战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都是美国知识界的“显学”,而犹太知识分子以及犹太问题也借此进一步走入了美国知识界的大舞台。

此外,一直普遍困扰犹太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问题到了冷战期间也逐渐解决。一方面,在二战中,美国在某种意义上扮演了犹太民族“救世主”的角色。纳粹有计划的大规模灭犹可以说是历史上对犹太民族生存威胁最大的一次灭犹运动,从根本上威胁到了全体犹太人的生存。而击败了纳粹的美国则被视为拯救犹太民族的救星,自然也就受到了犹太知识分子的推崇。也正因如此,贝尔在美国向纳粹宣战的时候曾经自问自答道:“难道这时候我还能够反对美国吗?”^②而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犹太人整体上基本融入了美国社会,与战前不同的是,战后绝大部分犹太青年已经对于他们移民祖先的欧洲老家及其文化缺少感情,美国犹太人已经普遍接受了自己“美国人”的属性,甚至于作为犹太教拉比的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戈德斯坦(Israel Goldstein)也声称:“美国犹太人就是美国的一部分,因此美国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③此前一直对“美国化”身份感到焦虑的犹太知识分子在战后也逐渐不再抗拒,“美国文化”此时反而成为了许多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1952年,由《党人评论》组织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Our Country, Our Culture)研讨会中就有大量曾经追求世界主义或者投身于无产阶级文学的犹太知识分子参与其中。研讨会的一个主题就是不再与美国以及美国文化保持距离,反而要参与其中,因为美国以及美国文化已经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也是研讨会主题中将美国称为“我们的国

①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1951.

② Joseph Dorman, *Arguing the World: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Their Own Word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 82.

③ Valerie Sandler Thaler, “The Reshaping of American Jewish Identity, 1945 to 1960,” PhD dissertation of Yale University, 2008, p. 2.



家”，将美国文化称为“我们的文化”的原因所在。^① 对“美国化”身份的坦然接受结束了许多犹太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于身份认同的焦虑。

最后，从经济社会层面来看，战后犹太知识分子的经济社会状况与战前的“无产阶级立场”已经大为不同。到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犹太知识分子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犹太知识分子已经大量出现在了高校，与战前相比反差尤为显著。在战前，哥伦比亚大学有位校长甚至曾经公开声称犹太后裔“缺乏社会技能”，“并非传统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理想同伴”。^② 然而战后，不仅大量犹太学生进入了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在内的美国顶尖高校，犹太知识分子也逐步进入高校加入了学院派的队伍，较为著名的包括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的社会学家贝尔，以及 1946 年升为哈佛大学副教授，1954 年升为历史学教授的小施莱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Jr.)。此时的犹太知识分子已经深度参与到了美国高校中。知识分子阶层地位的改变，也使得战后没有多少犹太知识分子再投身于共产主义左翼激进政治运动。

概括地讲，笔者认为，到冷战期间美国犹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越来越弱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无论是思想、经济还是情感方面，“犹太性”与“美国化”两者之间的张力逐渐被弥合，而美国也越来越为犹太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好的平台。而在张力弥合之后，犹太知识分子在文学创作之中也逐渐不再表现出对“犹太性”的抗拒，转而敢于正面“犹太”问题，从而形成了今日这般兼具两者特性的美国犹太知识分子群体。

①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研讨会以文章笔谈的形式在 1952 年的《党人评论》第 3 期至第 5 期连载了 3 期，详见 *Partisan Review*, Vol. 19, No. 3-5, 1952.

② Joseph Dorman, *Arguing the World: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Their Own Word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 44.